清史 探秘

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文化报社 合办

紫禁城在明清两代统治者的眼中从来都是固若金汤的,然而,清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天理教徒以攻占紫禁城为主要目的的反清起义,却令皇宫内的统治者猝不及防,乱作一团。

天理教徒攻袭紫禁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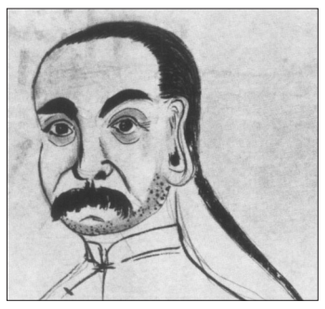
李尚英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收录了清廷剿平天理教起义的经过及有关文件,其中也承认造成起义的根本原因是贫困。

距今197年前的秋冬之际,在清皇朝的统治中枢——北京皇宫(紫禁城)内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这就是仁宗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徒举行的以攻占紫禁城为主要目的的反清起义。

起义因贫困而起

北京是清朝的京城,号称"首善之区"。乾隆后期至嘉庆前中期,由于统治阶级过度的抢夺、兼并土地,以及官吏贪污、营私舞弊盛行,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贫困。据史载,京城外数十里之地即如穷乡僻壤,广大人民家无积蓄,"一遇凶年,支绌立见"。嘉庆时期,京畿地区和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占有数百上千亩土地的地主比比皆是,而广大农民终岁辛劳,"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季啼饥号寒,几于无生"之人。



清人绘林清像

嘉庆十七、十八年,上述地区连遭自然灾害,到处都是"歉收处所",京畿有的县一亩地只打一二斗粮食。广大人民衣食无着,"皆以草根树皮糊口度日",地方官吏又乘机催科、派差,更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以致"思乱者众"。京畿地区终于在嘉庆十八年九月,由以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天理教发动了惊人的"紫禁城之变"。这次起义失败后,嘉庆帝"几暇静思其变故",不得不承认"总由贫困而起"。这确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天理教是由活动在京畿地区的弘阳教、坎卦教和活跃在直鲁豫地区的以震、离二卦为主的八卦教联合组成的一个民间秘密宗教团体,首领主要是林清(京畿)、李文成(河南)、冯克善(山东)。他们从传教收徒、扩大组织到武装起义,经过了长期的准备。早在嘉庆十六年(1811),三人就多次秘密集会,制定起义计划,决定由林清负责先攻取北京,李、冯在分别夺取河南、山东后派人马接应,会师后,趁嘉庆帝巡幸回銮中,将满族统治者赶回东北。

从嘉庆十六年起,林清就在京畿一带积极传教收徒,为起义做准备。他命令天理教骨干李五在固安县加紧打制刀枪武器,又从居住在宛平县的天理教信徒中选拔精壮青年200余人,每天舞弄枪棒,进行操练,组成了一支起义军。同时,林清又秘密联络宫中地位低微的太监,使他们成为起义军进攻紫禁城的向导和内应。

嘉庆十八年初,林清在京畿地区广泛宣传夺取天下的思想,制造了各种谶语,如"若要白面贱,除非林清坐了殿"、天理教"要改天换地了"等,实际上成为了起义的一种舆论准备。八月,林清和李文成派来的刘成章共同议定了京畿地区起义的具体计划,决定以"奉天开道"白布旗为标志,暗号是"得胜",组成一支100余人的队伍,每人头上、腰间各缠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同心合我,永不分离"或"四季平安"字样,作为识别标志。林清还决定,起义军分东西两路,分别在太监刘得财、刘金、杨进忠、高广幅等带领下,由东、西华门攻入紫禁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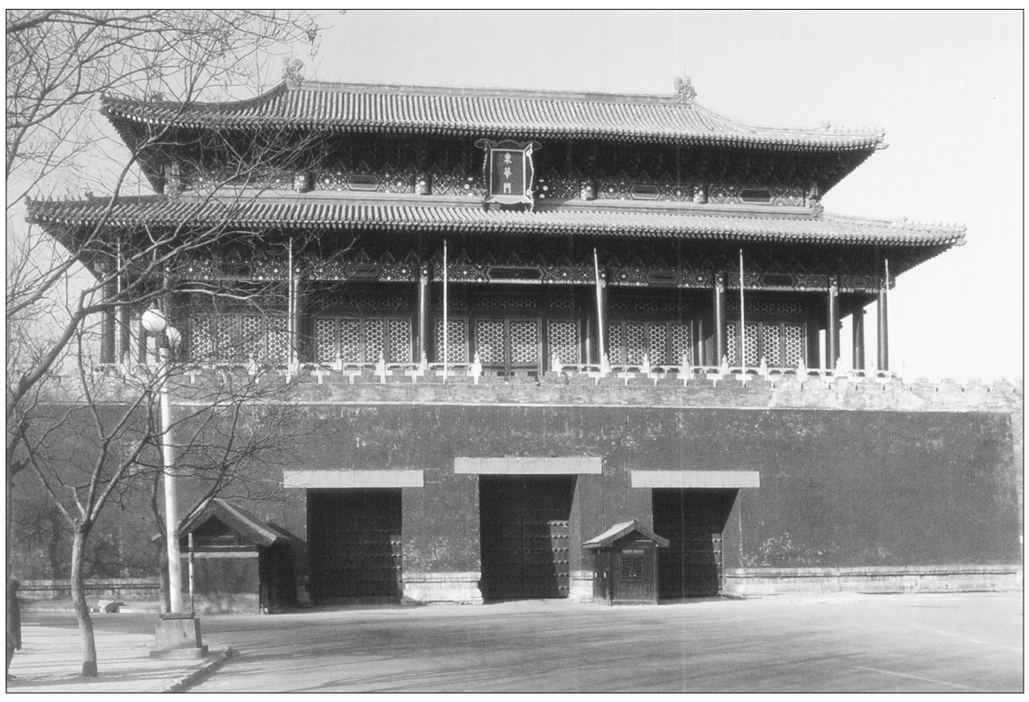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际,河南李文成等人因机密失泄被捕。为搭救李文成等人出狱,其部下于九月初七日提前起义。林清却因不知此事,仍按原计划行事。

紫禁城内的混战

九月十五日晨,天理教徒分作东西两路,东路在首领陈爽、陈文魁带领下进攻东华门,西路在刘第五、祝现等带领下进攻西华门。日方晡时(下午3点至5点之间),来到东华门的天理教徒由于和往宫中送煤的人发生了争执,一名天理教徒脱衣露刃,送煤人急声呼喊,被守门清军听见,急忙关闭宫门。天理教徒见势不妙,即刻抽出战刀,径直冲入门内。结果只冲进了陈爽等数人,大门就已关闭,陈文魁和大部分教徒则被挡在门外,被迫分散,各自出城隐匿起来。陈爽等在太监刘得财、刘金引导下,于协和门与清军展开激战。礼部侍郎觉罗宝兴命人关闭景运门,入告皇次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旻宁慌忙下令取撒袋、鸟枪、腰刀迎战。

攻打西华门的天理教徒在太监杨进忠的接应下,全队五六十人顺利冲进门内,迅速关闭城门,以拒官军;又爬上城楼,插上白旗,以号召城外的天理教徒。接着有一部分天理教徒向皇帝居住的养心殿进发,他们打着"大明天顺""顺天保民"的小白旗,由太监高广幅等引路,很快打到了隆宗门一带。此时隆宗门已关闭,天理教徒抢下门外摆放的弓箭,向门内施放起来。至今隆宗门匾额右上方遗留的一支箭头,很可能就是他们所射。另一部分天理教徒也打到文颖馆、尚衣监等地,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

天理教徒攻进紫禁城,使清统治者猝不及防,乱作一团,旻宁与几个亲王仓皇迎战。这时几个天理教徒已翻越宫墙来到养心殿附近,旻宁慌乱中用鸟枪击毙两名教徒。礼亲王昭梿、庄亲王绵课闻变后,临时调来千余名火器营兵,赶至隆宗门下,与天理教徒展开激战。天理教徒虽拼命抵御,但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很快即被打散,刘第五、祝现等人跳城逃脱,未能冲出城的天理教徒也在慌乱中分别潜伏于宫中各处,继续坚持战斗。天理教首领李五在清军搜捕时,挺刀"与官兵格杀,被伤甚重,是夜毙焉"。有一位天理教徒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被捕后回忆当年在紫禁城内的战斗情形时说:"我藏在夹道子里,只见一个头戴水晶顶大花翎子的官员,向一个白布缠头拿刀的追赶,那官员赶上,踢掉刀子,就用腰刀将他杀了。我因同教的人被杀,就上前拾起刀子,把他砍倒……我是习教弟子,一秉至诚,死而无怨。"这些都表明了天理教徒起义时的奋不顾身、视死如归。



林清起义军进攻皇宫时,从紫禁城东华门冲入禁宫,但很快就被官军发觉,城门即刻被关闭。图为紫禁城东华门。

与天理教徒的顽强斗争精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统治者的惊慌之态。宫廷内的后妃、皇子以及显贵大臣、武将勋戚等,平时作威作福,神气十足,然而紫禁城内的惊人之变,犹如晴天霹雳,吓得他们魂飞魄散,尽成惊弓之鸟,纷纷逃离紫禁城。直至九月十七日,皇亲国戚以及大臣、兵丁还心神未定,遇有动静,草木皆兵。

九月十六、十七两日,清军在宫门内大肆搜索,擒获30多个天理教徒。十七日早,由于叛徒告密,坐镇大兴黄村的天理教首领林清被捕。至此,天理教在京城的反清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严酷镇压 恐留后患

紫禁城之变发生时,嘉庆帝正驻跸热河。他得知消息后,惊恐万状,马上中断"秋狝行围","即命回銮",于十九日回到紫禁城。对于这次事变,他一面做出姿态,下"罪己诏",一面大骂林清和天理教徒骚扰禁城,谋危社稷,"罪大恶极"。在派兵捉拿林清的同时,又命火焚黄村,"终夜火光燎然"。嘉庆帝又多次指示内阁,对造反的天理教徒"必应详审周密,勿留遗孽"。二十三日,他亲至中南海丰泽园,当堂审讯和处死了林清和太监刘得财、刘金等人。此后又对其他被捕的天理教徒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严酷刑讯,施用了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最后将300多名天理教徒及其家属分别处以死刑、流徙和发遣到边疆为奴。

清廷在镇压了京畿地区的天理教起义后,又先后镇压了河南李文成、山东冯克善领导的反清起义。

林清领导的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的战斗虽然失败了,但却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惊人的壮举。紫禁城在明清两代统治者的眼里从来都是"固若金汤"的,这次居然被几十名手持大刀的天理教徒一拥而进,搅得不宁,充分暴露了清统治者的腐朽、没落。难怪嘉庆帝在谕旨和诗词中不止一次地哀叹:"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这是清朝统治中国170多年来,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对自己的统治权力产生巨大危机感的反映。后人也曾指出:"自是之后,清廷纲纪之弛废,臣僚之冗劣,人心之不附,兵力之已衰,悉暴无遗……故是役为有清一代兴亡之关键。"这充分说明,林清等人领导的这次反清起义,在嘉庆初年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起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把清王朝推向下坡路。

作者简介

李尚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学报编辑部原副主编、编审。主要著作有:《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等。

迈向海洋的轨迹

——我国古代的造船技艺

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广泛使用了独木舟和筏,并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走向海洋。据考证,筏——舟船发明以前出现的第一种水上运载工具,就是新石器时期我国东南部的百越人发明的。

先秦时期,生养栖息于南海之滨的越人以自然物制成浮具、竹筏、木筏、独木舟、木板船,用于渔猎运输。帆、桨、篙、舵、碇俱全的"南越舟""八槽舰"是见于汉代文献记载的广式船舶。西汉时期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巨舶在广州和古罗马的阿杜利港之间运送丝绸、珠宝、香料、矿物等大宗货物。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广州起航的航海帆船已可以到达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亚丁港。

唐代后期,海上丝绸之路经南洋、西亚和东非,跨越欧、亚、非三大洲,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设有专门从事航海贸易的市舶司,每年进入广州港的海船约4000艘。因产地而得名的福船和广船以载重量大、结构坚固、抗风力强和航海性能好而闻名中外,是适应中国南方海阔水深、多岛屿地理环境的两种船型,多行走于南洋深水航线。《新唐书》记载:仅广州一地一次"能造海船五百艘",其中,苍船长二十丈(约66.6米),能载六七百人,木兰舟能载1000人。广式海船在用材上以热带硬木和荔枝木、樟木、乌婪木为主,用铁钉连接铆牢,船型首尖体长,吃水较深,梁拱小,甲板脊弧不高,有较好的适航性能和较大的续航力。船体结构横向是以密距肋骨与隔舱板构成,纵向强度依靠龙骨。舵板上开有成排的菱形小孔,操纵省力。

宋代时,广州海船建造技艺更趋成熟。由广州开往西洋的船舶统称"蕃船",与泉州"海舶"、明州"船舶"齐名,特别重视加强船舶的纵向强度,底部以从头到尾的龙骨为主干,船壳是由多层板料叠加而成,采用榫合钉接法,将构件坚实地连接起来,精工细作的捻缝工艺保障了船舱的水密性,运用升降舵、平衡舵和披水板提高了船舶的操纵性。

在元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开始从广州移到泉州,但广州对外贸易的规模仍然最大。为了东、西洋的海上远征和大规模的海运漕粮,元代设置了广州造船坊。

明朝洪武初年,广东蛋民编入水军,并由富户建造外海渔船兼战船。明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更成为了中国古代造船、航海的顶峰。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俞大猷、戚继光、汤克宽等在领兵抗倭时,进一步完善了广船的性能,使广船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战船船型。明中期以后,中国走向海洋的步伐开始变慢。同一时期,西方诸国先后在马六甲、爪哇、菲律宾等地建立了殖民地。1553年,葡萄牙租占澳门,各国商船纷纷停泊此地,在明朝海禁的政策之下,澳门成了广东外贸的中转港。1565年,由西班牙人开辟的"广东——菲律宾——墨西哥"大三角贸易航线横跨太平洋,主要进行中国丝货贸易,故称太平洋丝路,又称为大帆船贸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在明朝近300年的历史中,中国的造船业基地仍以广东、福建和江南为主。

清朝顺治年间,中国迈向海洋的脚步放缓。康熙年间南洋贸易被禁止,出洋帆船只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超过一丈八尺(约6米)。乾隆年间只限广州一地对外开放。1727年复开海禁后,清代的远洋航运又进入兴盛时期。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期间,广船船型吸收了西方船形的一些优良特点,如使用钢丝索侧拉桅杆,使用钢制滑轮等。1846年,英国航海商在香港建造的"耆英"号广船由30名中国水手和12名英国水手驾驶,从香港起航进行环球航行,在纽约停泊时,日参观者达七八千人。在伦敦停靠时,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自登船参观第一艘到达欧美的广式木帆船,见证了中国帆船精致的构造和优良的性能。

■文摘

大清朝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覃波 唐水

一位清朝时曾在广州十三行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说:"伍浩官(伍秉鉴)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辩论的题目。""1834年,有一次,浩官对他的各种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估计了一下,共约2600万元。"而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最富有的人资产也不过700万元。美国学者马士说,"在当时,伍氏的资产是一笔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商人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业巨头。2001年,伍秉鉴与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以及成吉思汗、和珅、宋子文等人一起,被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为上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

图为广州十三行外商商馆大厅

一向重农抑商的大清朝竟出了位"世界首富",这位伍富翁是个什么样的人?

17世纪后期,广州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口岸"。依托这个黄金口岸,手持官府赐予的垄断外贸权,加之自身的努力经营,广州十三行这个商人群体迅速崛起,与两淮盐商、晋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

伍秉鉴便是这"堆满银钱"的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员。1801年,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十三行中的怡和行,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外贸代理生涯。但是,行商的身份只是致富的机会而非发达的充分条件。十三行首次被官府指定的外贸代理洋行有13家,此后,因贸易形势的起伏而变动不定,最多时有26家,最少时只有4家,可见这个行当的风险之大。伍秉鉴走上十三行舞台时,行商的领袖,即"总商",是潘振承创办的同文行。伍秉鉴的父亲也是靠曾在潘家担任账房,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多有来往并在其扶植之下,才创办了怡和行。伍秉鉴不但让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潘氏成为行商总商,更让伍家的资产达到十三行的顶峰,这自有其独到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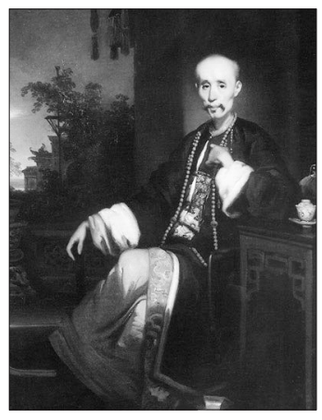
对于从事外贸代理业务的大清行商来说,全部的贸易机会都寄托在洋商身上,这里充满着激烈的行业竞争。而伍秉鉴首先做到的,就是"征服"了洋商。

当时,行商与外商的交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双方的贸易经营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书面契约。1805年,外国商号按照约定运到广州一批棉花,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万多元。有人因此认为他"天生性格谦恭顺从",并以习惯思维揣度他面对洋商"胆小如鼠、懦弱无能",但事实上,伍秉鉴却凭借这样的做法广结善缘,与许多洋商建立起私人的友谊,而且彼此信赖——这种相互信任在无契约基础的贸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尤为关键的。

在西方人眼中,伍秉鉴"诚实、亲切、细心、慷慨"。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美国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掉了借据,让他放心地回国。

其实,伍秉鉴在经营中是工于心计的,有记载说,他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计算出的利息,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当时的外商极为惊讶——这也是双方相互信任的重要基础。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手,尽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费较高,但仍乐意与他交易。

在一些外商的日记、笔记中,伍秉鉴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熟悉他的外商都说他"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不懂得幽默不要紧,伍秉鉴在外国人眼中仍然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的重要客户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大班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



19世纪前半期广州商界的领袖、"红顶商人"伍秉鉴。

伍秉鉴在拥有足够财力后,很注重驾驭笼络其他行商。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他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后来一位老行商刘德章因为得罪英国公司失去了贸易份额,伍秉鉴又出面斡旋,使公司恢复了他的份额。另一位行商黎光远因经营不力破产,按当时朝廷的规定,要被充军伊犁,伍家便筹款捐助他在流放地的生活。从1811年到1819年,伍秉鉴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达200余万银元,使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于他。伍秉鉴就是这样在洋行中恩威并施,影响力举足轻重。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领袖,即十三行公行的总商。

(摘自《中华遗产》2010年第6期)